

中國古外銷陶瓷 研究資料

第三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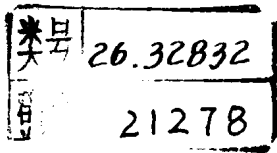
中國古陶瓷研究会
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会

一九八三·六

类号 26.32832
册号 21278

内部资料

通讯处：福建省厦门大学历史系转
印刷者：厦门大学印刷厂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

第三辑
1983. 6

一、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 (1) 序 东京国立博物馆 (1)
(2) 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 [日] 矢部良明 (2)
(3) 日本出土的元明陶瓷 [日] 长谷部乐尔 (27)

二、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与越窑青瓷 [日] 三上次男 (42)

- (1) 带到伊朗来的唐宋陶瓷 (42)
(2) 伊朗出土的长沙铜官窑与越窑青瓷 (44)
(3) 西拉福遗址及其调查 (49)
(4) 西拉福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 (50)
(5) 西拉福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之考察 (53)
(6) 运到西拉福的中国陶瓷的年代 (57)
(7) 西拉福遗址中各种中国陶瓷的状态 (59)
(8) 唐代末期的中国陶瓷的性格 (63)

——特别是长沙铜官窑瓷和象塘窑青瓷——

三、唐末作为贸易陶瓷的长沙铜官窑瓷 [日] 三上次男 (74)

四、唐三彩的后裔 [日] 三上次男 (78)

五、元代陶瓷器和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的新资料 [日] 三上次男 (81)

六、~~青森北海道的中国陶瓷~~——以青森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为中心 [日] 三上次男等 (88)

- 七、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 [日]三杉隆敏(92)
- 八、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熊本县博物馆《中国陶瓷之美》序言 (110)
- 九、日本海的陶瓷贸易 [日]佐佐木达夫(114)
- 十、景德镇陶瓷生产与贸易状况 [日]吉田光邦(137)
- 十一、天 目 [日]奥田直荣(149)
- 十二、美国佛罗里达州文化遗址出土的中国明末清初瓷器碎片
[美]卡麦尔·阿加-奥格鲁(155)
- 十三、从北美太平洋沿岸遗址发掘的中国瓷器 奎尔马兹(165)
- 十四、从美国佛罗里达州文化遗址出土的东方瓷器在考古学上的意义
[美]史密斯(168)
- 十五、东非海岸发现的中国瓷器 菲利司(171)

《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序

东京国立博物馆于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自六月起至七月止举办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特别展览。这次展览如标题所示，是把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不仅是完整的器物的，也包括陶片，从全国搜集，把资料性较强的遗物汇集到展览厅，以供一般的鉴赏。

中国陶瓷被请（指佛教用品类——译者）到日本，其输入的源流久远，历史很长。在相当于中国唐代的奈良时代就已经开始运来了，以后作为珍贵的宝物或用作实用的器皿而常常在人们的生活中遇到。这是根据记载和传世遗物也可以了解到的。但更确切、更详细地说明问题的资料，主要地还是靠考古学的调查而从全国各地发现的遗物和陶片之类，尤其是能够说明开始接纳的、宝贵的资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关于中国陶瓷，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给以注意是昭和初年，直到近年来才由极少数人进行细致的调查，这是总的情况。但从昭和四十年代（一九四五～一九七五——译者），随着全国范围的建设开发，主要是由于行政方面的发掘才有中国陶瓷的大量出土，调查的事例一下子就增多起来了。取得了这些丰富的资料之后，过去的学者先辈们便承担起踏实的研究工作，从而将把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可以说这是目前的现状。

发掘物的大部分不过是一些零碎的破片而已。但出土的陶瓷却具备着出土物的全部特征，是有价值的。其中特别值得着重描述的就是这些出土器物是与遗址、遗留建筑物有密切的联系；因而，由于是某个时代、具有某种特性的遗址出土的，而可作为研究社会史、文化史，有时是宗教方面的资料，具有历史、考古资料方面较高的价值。此外，中国陶瓷都是运到日本的什么地方来了，怎样分布的；如果着眼于流通方面，则作为交易史、商业史的资料是有用的；从中国陶瓷自始至终在给予我国陶瓷业以巨大影响这个角度来说，当然，这些出土物对于研究日本陶瓷史是不可缺少的资料。此外，作为出土的中国陶瓷来说，其用途是与其他各外国出土的中国陶瓷进行比较；这样，其意义就更加深远起来了。中国陶瓷自汉代开始一直到近代为止，输出到了东亚这是不必说了，也送到了中亚、南亚、东非、欧洲，一直到美洲大陆，在各个地区都成为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从而起着重大的作用。把其他地方出土的和日本出土的进行比较时，就会使日本独

自地接纳中国陶瓷的情况在世界史上自然地展现出来。

这本图册就是为了具体地理解带有这许多问题的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而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遗物，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而编辑成的。因此，在排列照片图版时，前半为完整的器物，以便能统览由唐代至明代（奈良时代——江户时代）的作品特征，后半是把由著名遗址成批出土的陶片按不同的出土地点而分类，以便能明了中国陶瓷的普及情况。此外，本图册所发表的器物品种是以特别展览的展出品为重点，当时未能展出的遗物和以后新发现的重要资料也进行了收录，以求内容充实。

本书的出版是特别展览中积极提供展品的珍藏者各位，以及给以大力协助的有关人员的热情关怀、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在此向以上各位深表谢意的同时，如果本书能成为各位研究人员及有识之士的良好伴侣，进而能引起世人对出土的中国陶瓷的关心的话，实感幸福。（昭和五十三年三月）

东京国立博物馆

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

[日] 矢部良明著

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正式的政治交往始于汉代。迄今为止，文化交流连绵不断，这种相互关系从中国陶瓷的具体素材看来，一直保持着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优秀的中国陶瓷，从中国传来或输入日本，应是隋初唐七世纪之际。即从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在日本大量地烧制陶器或须惠器，陶瓷器的需要量增加了，但是，尽管代表当时中国的青瓷、黑釉陶（天目）在我国对岸的浙江省大量地烧造，而送到日本来的迹象几乎看不到。这是中国陶瓷输入日本长久历史开端出现的一个谜。

例如，在古坟时代，大和政权稳定、扩大的情况，可从中国魏镜和我国仿制的镜子得到证实，认真比较一下古坟时代中国铜镜这些贵重文物，在数量众多的古坟时期的随葬品中，看不到中国陶瓷的片鳞只羽，这是非常明显的对照；推测是在以当时的当权者为首的统治阶层之间，中国陶瓷还不成为他们关心的对象。

一方面，从作为汉代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已知六朝时代的陶瓷的出土品有六件。一九六九年从南朝鲜忠清南道天原郡出土青瓷天鸡壶、一九六九年四月又从忠清南道天原

郡城南面出土了青瓷四耳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的石槨墓出土了青瓷羊，而且还有出土地点不清楚的、金炯泰氏所藏的黑釉天鸡壶，全部是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从西晋到东晋时代称之为古越瓷的浙江省青瓷和黑釉陶。接着，从南朝梁代营造的百济武宁王陵（忠清南道公州郡所在地，五二五年埋葬），一九七四年曾发现白瓷小碗五个、青瓷四耳壶一个、青瓷六耳壶二个，还有一九七六年从新罗时代的故庆州市九八号后坟中出土了六世纪时的褐釉小壶一个，此事记忆犹新。

从朝鲜半岛出土的这些四一六世纪的中国陶瓷，当然是和六朝特别是南朝密切关联的雄辩的证明材料。六朝时代前半期的中国陶瓷之中，优秀的施釉陶瓷几乎是在南朝领域内的浙江省烧制的，因此，从在江苏省以南京为中心的许多南朝的帝王和王侯贵族的坟墓里，出土优质的越州窑青瓷和天目瓷是理所当然的，在南北朝占有的中原地区，真正施釉瓷窑的开创，是从六朝后期的东西魏到北齐、北周时期，即六世纪后半。

如上所述，从我国古坟中发现的中国镜主要是华北的镜，以及重新压模的同范镜，被作为权威的象征而受到珍重，这些装饰南朝贵族坟墓的最重要明器—古越窑瓷在日本并不流行，有什么关连呢？东晋义熙九年（413年）时，从日本开始向安帝献方物，在《晋书》、《宋书》、《齐书》、《梁书》中记载着，有名的倭五王：讚、珍、济、兴、武和南朝正式的国交，五世纪倭王的朝贡以交换的货物和册封在史书中留下了任官的记录。这种政治交往给文化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具体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从古越瓷上找具体事例，则当时我国正是大规模进行造坟之时，当权者应该对于中国南朝坟墓的明器表示关心，而实际上，古越瓷并没请来日本，这件事之中，百济、新罗和我国的统治者对中国文物怀有不同的兴趣，进而可以部分地看出中国和日本的随葬品和造坟的意义是不同的。

但是，有一个不是按照正确的考古学发掘的顺序的例子，几年前在爱媛县松山市古三津的山林砂崩塌的现场中，偶然发现四世纪东晋时代的古越瓷的青瓷四耳小壶（插图1）。此外，在九州看到了据说是传世的、即所谓中途传世的东晋时代的青瓷盘口壶，在我国古越瓷完全没输入，尚不能断言。相反应该认为存在着输入的可能性，在将来的调查中，如从古坟内发现古越瓷，上述的解释多少应作些变更吧。

可是，关于古越瓷，作为世界最古的传世中国陶瓷而著称于世的法隆寺传来品，有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保存的青瓷四耳壶（插图2）。在近代制造的同一个箱中有写着：“……都将来青瓷丁字壶”墨书的贴纸，实际上，因此丁字至今尚有残存，一种说法：在天平十九年（747年）勘录的《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记载着天平六年（734年）收藏由平城宫皇后宫职赐与的装丁子香的壶。这件器物，体部呈园形，颈部粗的盘口壶的形制，从中国的出土例看来，在隋唐时期这样的古越瓷尚无出土，反之，看作是

同西晋以来的盘口壶的系谱相连的六朝后期的制品不是不合适的，它作为是最确切的日本传世的古越瓷，有着贵重的资料价值。

接着，一九七五年奈良国立文物研究所对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大字小山的大宫大寺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调查，从寺院建筑物遗址层之下出土了绿褐釉陶片。根据调查报告，从伴随出土的陶器看，这个层位位于七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位置。如报告所述，不能判定这块陶片是否是小壶。因为是相当于所谓白凤文化期（645—709年）的时代的东西，所以这个时期的施釉陶器应该引起注意。但是，到底是中国制的呢？还是从朝鲜半岛来的输入品？还是日本制的？这个碎片不具有确定的标志。还有，一九六五年从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御坊山古坟出土的挂有绿釉白釉混新的三彩小砚（插图3），是属于六朝以来的多足砚，遗址被认为是古坟末期七世纪后半期营造的，作为资料是贵重的，但仍缺乏确定产地的基本要素，可能是从朝鲜半岛来的请来品。

二

这样，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之间，传入我国的中国陶瓷的事例很零碎，而且第一等的材料只不过一例。换言之，可以判断，中国陶瓷尚未成为吸引当时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人们的兴趣的对象。

五世纪倭五王向南朝派遣使节以来，不久就中断了，正式的遣使是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由圣德太子向统一的大帝国隋派遣使节而再次开始，并直接接触首都洛阳的文化。代隋而起的是六一八年再次统一中国的唐王朝，基本上继承隋朝的制度，统治更加巩固，在此基础上诸文化竞妍兴盛，在陶瓷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新的转机是三彩的出现。唐三彩，现在从唐墓出土墓志的纪年铭看来，可以判明是从武后末年（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到玄宗的开元、天宝（八世纪前半）统治时制作的，以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年）为分界，唐三彩急剧消失了。唐三彩在长安与洛阳上层人物的坟墓中主要作为明器而随葬，其中虽少，器皿类是被带到中国各地随葬。只是唐三彩似乎并不全都是随葬品，似乎有外国使节或民间人们，把唐三彩作为赠送、收藏这几种情形。一九七三年四月在南朝鲜庆州市朝阳洞发现的藏骨器三彩钺，是在中国以外发现的唯一完整器的唐三彩，是件出色的兰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杰作。

盛唐时的三彩从我国六处被发现。福冈县三处、奈良县的奈良盆地内三处。位于北九州の玄海滩的弧岛冲之岛是从四世纪末到九世纪的祭祀遗址，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九年二次调查未发现古越瓷，而曾采集到二十二片唐三彩的破片，这些全是同一件器物的碎片（第2图），小山富士夫氏推断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横河搜藏处的三彩贴花纹长颈瓶（插图4）相似。还有一九七七年从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观世音寺，也出土一片三

彩的破片，估计是锃的一部分（第4图），同年年底，在太宰府郭域内的太宰府町字市之上的遗址，又发现了陶枕的一部分，它是在作成搅胎的胎土上施以黄釉，引人注目。在镇守九州同时是外交派出机关的太宰府，盛唐文物首先运到是极其自然的。因此，如果进行调查，估计三彩的出土数量今后会日益增加，将来是很有希望的地区。

自不待言，奈良盆地自古坟时代的大和政权以来，是飞鸟奈良时代日本的政治中心。该处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从奈良市大安寺町的大安寺遗址，曾从金堂和讲堂的烧土层，发现唐三彩及搅胎陶的陶枕（彩版第7、第1图）。件数超过三十件的陶片，从遗址看来全是陶枕，推测不是明器而是实用器。大安寺是在东大寺建立以前，被誉为宫寺中的第一位的著名寺院，是迁造藤原京的大宫大寺，众所周知，其创建时，第七次遣唐使随行僧道慈律师是创建者。他于养老二年（718年）归国，在长安时，曾住在西明寺，此时厚葬之风弥漫，他曾亲眼见到艳丽的唐三彩收入多数贵族的坟墓之中。

一九六八年从樱井市定倍废寺北面迴廊，出土了许多唐三彩遗物，推测是锃的一部分的兽脚部（第3图）。一九七二年以来，奈良国立文物研究所对高市郡明日香村祝户坂田寺遗址进行调查，曾出土认为是小壶的唐三彩碎片。

以上是现在确认的日本出土的六件唐三彩的概要。出土的事例少，除大安寺外，全不过是碎片。出土地点福冈和奈良集中在和中国交往路线的经由地和根据地的地区，这些素材是清楚地表明盛唐的都城文化是如何为我国上层人物憧憬好材料。同时，这些唐三彩实物也是表示我国产生仿制三彩趋势这一重要转机的资料。

留在正仓院的大量文书中有一串《造佛所作物帐》的断简，这件文书证实了从天平五年（733年）经过一年进行的关于营造兴福寺西金堂的记录，这是福山敏男氏据实论证的功绩。其中提出造瓷的材料，山崎一雄氏指出用这些材料可以制成绿釉、黄褐釉和三彩。稍早一些的神龟六年（729年）的墓誌铭，即从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都介野的小治田安万侣墓中，伴随出土了我国制造的三彩，一般称为奈良三彩的小壶破片。可以确认，在中国唐三彩的完美流行是从七〇〇年初，二十余年以后，其技法传播开了。这不仅是在盛唐长安的文化立即传播到我平城京的很好的例证，而且从日本陶瓷史的源流看，也是我国最初真正独特风格的施釉陶器产生的划时代的事件，除正仓院南珍藏起来的57件三彩、绿釉、黄釉、白釉陶之外，可以说是地下遗宝的从土中发掘出来的奈良三彩，遍及现在的福岛、千叶、埼玉、东京、神奈川、长野、三重、滋贺、奈良、大阪、和歌山、兵库、冈山、福冈、大分的一都一府十三个县，其范围从东北到九州广泛地分布。和唐三彩以安史之乱为分界，急剧衰微同样，奈良三彩虽然在奈良时代盛行，九世纪的平安时代初期时都不可思议地衰亡下去了。因此奈良三彩是推测奈良朝中央文化波及地方的好材料。

三

推测在唐代两京长安、洛阳的周围烧造的盛唐的三彩和式样很类似于三彩的华北白瓷，具有特别华丽的美，开展了漂亮的制陶手工业，因此存在于这个时期其它地方的制瓷技术几乎消声匿迹了。但是，在离开中原的浙江省，越州窑保持着三国六朝以来的传统而继续着青瓷生产，在湖南省六朝后期从越州窑逐渐独立，而在中唐时代驰名于天下的称之为岳州窑的青瓷窑产生了。因此，直到中晚唐，此地可能从岳州窑派生出来的长沙瓦渣坪窑成熟起来了。此外还有四川省邛崃山脉的山麓下的邛崃窑、成都市近郊的琉璃厂窑陆续诞生了，湖南省南部和广东省也修筑了几个小规模窑，这已为近年的考古发掘所确认。江南、四川、岭南的所谓华南的窑艺倒是超过了盛唐时期，从八世纪后半到九世纪的中、晚唐，看来有明显的起色，而且到了五代，迎来了既不同于盛唐也不同于北宋的晚唐五代的充满着制陶创新的时代。

由于安史之乱，作为盛唐政治体制基础的均田制崩溃了，以贵族为中心而构成的社会结束了，支持中唐以后陶瓷的主要人物，从贵族转到一般的市民阶层。因此，产业在全国活跃了，商业扩大了。在广阔的地区销路扩展，确立了商人的组织网，保持了需求的均衡。包括华北、华南在内的广大地区，陶瓷业兴起确实反映了这种时代的潮流。中国陶瓷被外国人单纯地当作珍贵货物之一的时代结束了，作为手工业产品输出外国是从晚唐时代以后，带入我国的中国陶瓷开始具有作为玩赏对象和商品的二重性格。向海外输出的主要陶瓷有青瓷、白瓷，还有具有晚唐五代特色火候高的黄釉陶，还有为数不多的三彩、绿釉陶等等。

战前在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大字通古贺字立明寺发现的越州窑青瓷钵（彩版第4、5图，福冈、观世音寺）是与唐三彩钵近似的器形，可以认为是盛唐式稍晚些的中唐的制品，越州窑青瓷之中这样流行于华北的事例极为罕见。

一九七四年秋，由奈良国立文物研究所发掘的奈良平城京左八条三坊，从东西小路南侧小沟中，发现了粗制的越州窑四耳壶（插图5）。从这条沟伴随出土的许多典型的奈良时代的土师器、须惠器，根据报告这件越州窑青瓷四耳壶也是八世纪制作的。这种圆肩、甑口式的四耳壶不是继承六朝以来传统的古越瓷的形式，而全部造型的特点同以后宋代样式相似，那种新的动向意外早地出现，使人惊奇。的确，圆肩甑口的特点，与前面提过的立明寺出土的青瓷钵是一致的。

以推断为八世纪的二例为开端，进入平安时代以后，越州窑青瓷的输入量好象急剧地增加了。根据平城京的调查报告，一九六九年从平城京东三坊大路的东侧沟的堆积土中，与日本制的绿釉陶器、灰釉陶器、须惠器、土师器同时，发现了很多的越州窑青

瓷、白瓷（第17图）。从这条沟的下层，伴随出土了贞观永宝（807年铸造）和天长七年（830年）的木简，与陶器编年对照起来判断为九世纪后半期的遗址。认为其年代稍晚的研究者也不少，这不仅是中国陶瓷，而且是日本陶瓷时代断代标尺的重要遗迹。其中具有越州窑特征的环形圈足青瓷碗和轮形圈足的折腰青瓷碗的破片出土了（插图6）。这二种碗是输入日本的越州窑青瓷最基本的碗。此外，还有越州窑青瓷碟、合子、壶的破片，还有三片的白瓷一起出土，也是值得注意的资料。

还有从奈良药师寺西僧房跡，与这两种越州窑青瓷碗和白瓷碗的破片，同时出土了长沙瓦渣坪窑的黄釉褐彩贴花纹水注破片（彩版第10、22图）。因为这座建筑物是天禄四年（973年）遭受火灾，所以可以断定其年代。从平安京内的京都四条御前路西北角，这种黄釉贴花纹的长沙瓦渣坪窑水注，也与越州窑青瓷同时出土，说明瓦渣坪窑的黄釉陶与越州窑同时输入。

此外，一九一五年从京都市右京区御室仁和寺圆堂遗址，出土了越州窑青瓷那么大的盒子（彩版第3、6、7图）和白瓷盒子（第19图）。盖子顶面凸起很多的大型青瓷盒子，其类似的器物如在中国的出土陶瓷中探寻，近似于一九五六年从江苏省连云港市王夫人墓（五代吴国的大和五年（933年）埋葬）中发现的白瓷盒子与此相似，王夫人墓的白瓷盒子，因为最盛行的是更加鼓起的，不妨可以把青瓷小盒子和白瓷小盒子看作是属于唐末五代初期盒子的范围，小山富士夫把这批出土品解释为延喜四年（904年）圆堂建立之际作为压胜器具而埋藏于土坛之中，与《扶桑略记》的记载相符合。

我国出土的越州窑青瓷之中，能够推断其遗址年代的资料，如果举中国的北宋时代，即我国平安中期以后的例子，则有从宇治市木幡御藏山西麓发现的青瓷水注（彩版第4、14图，京都国立博物馆）。由于该地被视作是宽弘二年（1005年）由藤原道长建立的净妙寺的旧址内，还又因藤原氏一族埋葬地是从980年开始的。因此，这件水注的上限可以考虑放在1000年前后。但是，腰圆，颈部粗，完全端正，注口呈弧形，对照中国越州窑水注的编年，放在十世纪后半不是牵强的。

十二世纪以后是进入南宋时代的时期，越州窑显著地衰退了，正是六朝以来浙江青瓷窑的领先地位让位给龙泉窑的交替时期。正如下面所述，从我国平安时代后期（二十世纪）的经塚中，特别是从九州经塚内集中出土的青瓷经筒虽是粗制器，具备越州窑的特征，表示了这一时期凋落的越州窑的情况，是不可忽略的资料。

以上，从八世纪开始到十二世纪为止，关于输入日本的越州窑青瓷，由龟井明德氏进行细致的整理研究。承蒙借用他的研究成果，得知越州窑青瓷的出土遗址，现在约有五十处，九州、中国地方、畿内及与之接壤的三重县，还有千叶县，特别是在偏远的宫城县的多贺城址外郭城的五万崎遗址也发现了越州窑青瓷。其中，质量上压倒其它遗址

的福冈市博多津太宰府鸿胪馆遗址，采集的陶瓷片达2500片以上(彩版第8、15、16图)。与许多遗址只能找到几件的情况，比较起来，这批数量庞大的陶片，可以说默认了这个遗址的性质，是平安时代从中国输入品唯一登陆港口的贸易会馆这一传说。

宽平六年(894年)菅原道真提出《请议定诸公卿废止遣唐使》的上奏文，遣唐使刚正式废止之后，据延喜三年(903年)的太政官符，其时关于博多津的民间贸易状况是这样记载的，“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官、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书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地迎接唐物，人们熬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附带提一下，在这里称为菅原道真的遗爱品，把大阪的道明寺天满宫传来的白瓷圆面砚发表出来(插图7)。

在遣唐使时代，为日本使节和中国使节而作为正式宾馆的鸿胪馆，遣唐使废止后，中国商人在这里停留，变成为和太宰府官吏的贸易中心，各称叫警护所，或叫警固所。唐人的来船，以承和九年(842年)，从明州(宁波)李隣德商船的来航为开端，年年增加，以后，为数众多的中国商客在我国史书中留下了名字。五代，和在浙江省建国称王的钱氏吴越国的交往极其密切，通过吴越的商人，平安京朝廷和吴越国的钱元瓘、元佐、弘俶进行书信交往，中国商人的活动已超过了商业活动而担负着政治外交的一部分任务。到晚唐五代，中国商人向我国出发的港口主要是明州，以鄞县窑、余姚窑、上虞窑为首的越州窑的名窑分布在明州背后的近旁。

这样一来，从中晚唐开始，支撑中国窑业生产扩大，建立完整的商品流通组织的商人有着活跃的动向，质量高的中国陶瓷在外国博得好评，需要和供给的关系有大幅度增长的基础。我国出土的越州窑青瓷应是那种历史事实真正的见证人。现在如果引用一下龟井德氏的研究结果，出土越州窑青瓷的遗址，以京师和国府为首的官衙，而且还有国分寺、定额寺等有势力的寺院等为主，单从以太宰府为中心的福冈县内的遗址来看，比较起来不能确定性质的不明瞭的遗址也不少。从那里出土的青瓷可以理解前面的延喜三年的太政官符记载的，冒犯禁令、争购唐物的吏民和富豪的暗中活跃的情况，在此，以越州窑青瓷作为贩卖商品对象的民间的动向，就会逐渐明瞭。

在我国发现的越州窑青瓷有碗、碟、水注、盒子、壶、唾壶、托子等等，其中碗和碟的出土量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最大。总数超过三千片的越州窑青瓷大致可分为精制品和粗制品。精品有着越州窑独特的坚緻，在灰色的素胎上，挂着薄的暗绿褐和绿褐色的釉。釉的色调因为从还原焰有效的浅黄色的美丽的东西，受到氧化作用而带褐色，范围很广泛。粗制品多是胎质粗糙，釉质粘着不好，粗糙的釉底者。由此，对日中诗文中，赞誉为秘色的越州窑的制品中，作为一般商品的青瓷，精粗差别如何之大便可以理解

的。必须注意的是具有越州窑精彩特征—流丽的细彫、半浮雕、浮雕，还有大胆的透彫等丰富多彩花纹的陶瓷片，在三千多件中几乎还未能见到，仅仅在太宰府鸿臚馆遗址的采集品中可以辨认出数件细彫、半浮雕的陶瓷片（插图8），除了具有宋初特点的莲瓣纹的一片外，一九三六年陈万里氏以窑址及其它陶片为基础而彙集的越州窑青瓷图案集《越瓷图录》中的典型花纹，在这里是见不到的。那就参考、比较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州窑青瓷陶片吧！福斯塔特在现在开罗的南郊，642年阿拉伯军攻占、征服埃及时建设的都城。1964、65年，以小山富士夫为团长的出光美术馆福斯塔特遗址调查团，对这里出土的陶瓷进行分类整理，仅第一次就检出越州窑青瓷673件。虽然在数量上不及鸿臚馆的出土品，而精美青瓷质量方面远远地超过它。包括许多确会被误认为秘色瓷，着绿色的美丽的釉色调的瓷器，而且，纤细的细彫、花纹很深带有阴影的半浮雕，还有精巧的透彫技法，运用自如，在上述的《越器图录》的图案中可照原样认出来这两处。出土越州窑青瓷世界上著名的遗址，如果对照出土的内容，其质量不同，明显地表示着输入我国的越瓷全都是劣等品。

我认为以明州为中心的商人们仅仅带来了越州窑青瓷，也带来了晚唐五代的长沙瓦渣坪窑的黄釉陶和白瓷。

如上所述从天禄四年（973年）烧毁的奈良药师寺西僧房遗址和平安京内的京都市四条御前路西北角，出土了瓦渣坪窑的褐彩贴花纹黄釉水注。在冲绳从西表岛的古墓中发现了瓦渣坪窑的典型的黄釉绿褐彩碗（第22、23图）。

此外，久留米市西谷火葬墓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纹壶和筑紫野市大门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纹水注等等，在粗糙的胎上，施以灰白色薄的白化粧土，再施褐彩，其施釉工序，看起来和瓦渣坪窑同样的手法，在釉、胎上，立即要断定是一个窑制作的，感到犹豫不决。

瓦渣坪窑的活动，确实始于晚唐时代。可以认为是岳州青瓷窑的分支，在花纹上，采用西方伊斯兰圈的图案，在中国陶瓷史上，是最早发明釉下彩的新技法，富有进取精神的窑场，上述的褐彩、绿彩就是这种釉下彩。位于湖南省长沙近傍的该窑的制品，从东南亚、西亚还有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都有所发现，是和越州窑青瓷同时输出外国的主要陶瓷之一，我国的出土品也是其中的一环。

如前报告九世纪后半，有的研究者甚至也推迟至十世纪的遗址，奈良市平城京东三坊大路东侧沟，和越州窑青瓷一起，三片白瓷碗片伴随出土，其后，从各地遗迹中，和越州窑青瓷一起出土了这种白瓷，一九七〇年从京都市下京区七条唐桥西寺迹出土达三十五片之多的白瓷，也是和十一片越州窑青瓷一起出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心（第18图）。现在由于龟井明德氏的努力，以西日本为中心，从大约20处遗址中检出这类白

瓷。特别是1975年，从天禄四年（973年）烧毁的奈良药师寺西僧房遗址中出土白瓷碗（彩版第2、20图），虽然残破成二半，但可以复原为完整的器形，包含着决定其下限的资料，是重大的发现。一九七六年，在宫城县多贺城市的多贺城五万崎遗址中也有发现。

小山富士夫曾把西寺址出土的白瓷片推断为唐代定窑的产品。其特征是在器形上有所谓环形的圈足，口沿部卷沿的美丽的碗，这种形式的白瓷，从河北省曲阳县涧滋村的定窑遗址中被发掘出来，所以是特制的定窑产品。但是，有报告说这种碗也曾在河南省磁州窑系的鹤壁窑、辉县窑、西关窑、曲河窑等处制造过，在四川省邛崃窑也生产过。目前情况下，在华南的窑是否制造过这种白瓷碗尚不清楚，长沙的出土品里这种白瓷碗很多，从具有五代纪年铭的华南的六个古墓中，出土了清楚的具有卷沿的碗。卷沿环形圈足的碗可以肯定是在五代时期烧造的，应是九世纪到十世纪的制品，但是不能全部断定是华北所产。特别是我国出土的白瓷碗，胎质不同于定窑，比较柔和，甚至有灰黑色的胎质，施用白化妆土做成多种多样的产品，在华南的白瓷窑制作的可能性较大。但是，铭有定窑“官”字的五代宋初的白瓷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被发现，磁州窑系的白化妆土的白釉陶在西亚和东南亚被发现，表明了晚唐五代的华北的白釉、白瓷曾向东南亚以西输出，因此现在也还不能说全部是华南的制品。1977年，从兵库县城崎郡日高町祢布个森西遗址中发现的轮形圈足、折腰的白瓷碟，在华北的白瓷中，还不见其例，而酷似于越州窑青瓷，看来具有江南白瓷的很好的特徵。

九—十世纪，日本制作的施釉陶，主要是绿釉陶和灰釉陶。绿釉陶和奈良三彩一样，是用铅作为媒熔剂的低温釉陶，在奈良时代三彩盛行，因为某种原因在平安时代变成了绿釉单一色的施釉陶。此外，如果灰釉陶技术有进展，就具有发展成青瓷的可能性，奈良时代的后半期，据说在爱知县的猿投窑，受到中国陶瓷刺激，人工施釉已开始进行。猿投窑的调查，以橿崎彰一为中心进行着学术发掘，如九世纪末到十世纪黑笹九十号窑的出土品，如：碗、壶、水注、香炉等等，明显地表现了受到晚唐五代越州窑青瓷的强烈影响。器皿里面也用细彫手法刻出花纹，带有独花朵雕刻进去使器形装饰手法丰富起来的尝试，明显地说明不仅仅是单纯的器形模仿，也波及到装饰方面。但是，从灰釉陶转向绿釉陶，可以看到更忠实地模仿越州窑青瓷的制品。环形圈足碗、轮圈足碗、折腰碗、五朵花碗、托、水注、盒子、唾壶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从京都市西寺出土的绿釉盒子、壶的破片（插图9）是从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越州制作的具有独特的器形和花纹的盒子和壶的直接模子。这种盒子和1976年从平城京遗址出土的绿釉透彫蝶文香炉的盖看来（插图10），可以推测在出土的陶片中未见的优秀的半浮彫，带透彫的越州窑青瓷虽然数量很少，但曾经进口过。这样，以中国陶瓷资料作为基础考虑

时，大致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可以认为曾大量地以绿釉的方式仿越州窑青瓷。在猿投窑，和灰釉陶一起，也曾烧制过绿釉陶，绿釉陶的主窑，当然是在畿内，已确认以滋贺、京都为中心的二十多处古窑址。从奈良三彩分离出来的绿釉，在平安时代十、十一世纪，当然，作为青瓷的代用品而大量烧造。

包括灰釉陶和绿釉陶在内，作为其造形范本的中国陶瓷仅仅是越州窑青瓷，单纯地仿制瓦渣坪窑的黄釉陶式白瓷的资料尚未见到。无论如何，在我国窑业的生产上，中国陶瓷的输入，在造形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反在容易得到中国陶瓷的九州地方，从平安时代到中世时代却带来了未曾培育起有力陶瓷的结果。的确，不管是灰釉陶或绿釉陶，九州的出土事例极少，其需给地区在近畿以东显著多起来这一事实，也可以从输入陶瓷的相关关系中，得到理解吧！

四

延久三年（1071年），为访问山西省圣地五台山而入宋的僧人成寻，在谒见神宗时，表述了在日本最需要的东西是香料、锦缎、苏芳，此外还有茶垞这是众所周知。茶垞是我国称呼中国陶瓷的特殊名称。这一时期是宋王朝经过著名的庆历之治，文治全盛时期，虽在军事方面甘于和北方的异民族缔结屈辱的盟约，但在文化上是日趋兴隆的时期。在陶瓷界，1000年时值从五代样式向北宋样式过渡的总趋势以来，新的作风展开了。可以举出的代表性的窑，有定窑的白瓷、耀州窑、临汝窑的北方青瓷、磁州窑的白釉陶、景德镇的青白瓷等，全是形成独特的固定样式的时期。

现在反过来看，寻找在日本出土的具备北宋样式的典型的中国陶瓷，除越州窑外，前述名窑的制品几乎是看不到。其中，只有一处例外，在昭和初年在天津南滋贺町发现的白瓷水注（彩版第5图，25图，滋贺、近江神宫）。圆腰鼓腹，呈喇叭状并连至颈部，长伸的注口，中间有明显的弯曲。这些可以说是北宋水注的特点，用阳刻的手法在腰部表现出六条竖向条纹饰，是华南的白瓷或青瓷流行的装饰花纹的特点，圈足削薄内凹，内侧露胎是华南青白瓷的显著特征，釉烧成含有灰色的青白色，很难说是最优秀的青白瓷，其造形的方法无疑地是北宋中期青白瓷属性的优秀作品。

此外，一九七六年，从久留米市御井町二本木遗址，出土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挂低温绿釉的小碗破片，这种小碗是用熟练的技法制出底花纹样，把素胎制成半球状的碗，挂白釉用高温烧成（彩版第9图）。这是很珍贵的磁州窑的制品，其制作时期推测是从北宋后期到南宋的十二世纪前半期。这个时期，在中原以定窑、磁州窑、临汝窑、耀州窑等名窑为中心，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制陶业，创造了北宋陶瓷的黄金时期，在这个制品以

外，还不知道可以认为是当时输入的中原陶瓷资料。仅仅从福井市一乘谷朝仓氏遗址，发现了带有划花纹的北宋定窑的白瓷钵小片（彩版第34图），从遗址性质看，很可能是以后从中国进口的陶瓷。

此外，从山口县光市清山出土的黑釉水注（第26图，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也和前述近江神宫的白瓷水注相似，不用阳刻，而把华南特有的竖条状花纹用简略的梳齿技法表现，是北宋后期的作品。虽然这件作品的窑还没弄清，但这是华南这一时期黑釉陶的珍贵资料。

一般说来，陶瓷器破损细碎，要想从那些碎片中复原成完整的器形，断定其时期有很大的困难。从全国出土的数量众多的中国陶瓷破片中，能复原出漂亮的北宋陶瓷也许还没有发现，据笔者所见到的，除了越州窑青瓷而外，北宋的典型作品只不过是以上几件。

但是，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西亚（西亚的资料少）的范围内，除越州窑青瓷外，有许多在我国的出土品中看不到的北宋陶瓷，可以确认。白瓷凤首瓶是其代表性作品。可能是从北宋前期到中期在华南不出名的瓷窑制作的。把类似于猛禽的凤凰装饰在口沿的稍下边，这种不朽形态的水注，在世界上只有三十余件，而且有报告说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大量出土过，战前在朝鲜半岛曾出土过，而在日本出土的事还未听说过。在东南亚的出土品中，包括推测是华南的白瓷，用北宋独特的严谨的半浮雕手法，雕出牡丹和宝相花的花纹的格调高的碗、钵，是和具有北宋特点的细雕、半浮雕花纹的越州窑青瓷一起被发现的，在越州窑和龙泉窑的制品中，青瓷莲弁纹壶、青瓷长颈瓶、青瓷牡丹卷草纹梅瓶是象征这些窑所具有的特征的漂亮造形的典型作品。

但是，称为中国陶瓷顶峰时期的北宋陶瓷的最优秀作品，在中国以外，朝鲜半岛有很多发现。那些陶瓷很多是在战前，从高丽时代的古坟中发掘出来而闻名于世的，遗憾的是，正式的调查报告书几乎没有。但是，据详细调查过中国陶瓷，包括最近出土品的崔淳雨氏说，现已查明，中国陶瓷在高丽的首都开城和江华岛出土者居多。而且，已知其中的定窑白瓷的遗品数量多，曾给予高丽时代器皿以强烈的影响。关于定窑白瓷，景德镇窑系统的青白瓷的出土事例很多。在北宋青瓷类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华南的越州窑和龙泉窑青瓷，临汝窑和耀州窑北方青瓷的优秀作品发现很多，也在华北地区出土了不少磁州窑独特风格的白釉黑花的优秀遗品，其中虽没有绿釉，但有与久留米市二本木遗址同样熟练的网带纹碗的发现是饶有趣味的。而且在华北的河南天目之中有真正出色的东西，包括定窑的黑釉金彩碗、柿釉碗等等。如上所述，综观全部出土品，崔氏考察认为，显示北宋中原陶瓷精华的窑艺几乎全部是在高丽时代传入此地。

这样看来，可以推定在有可能输出外国的北宋陶瓷中，输入我国的陶瓷，种类既贫

乏，质量又低劣。即便成寻向宋神宗提出过对于北宋陶瓷的渴望心情，如果根据考古学而现实地考虑，并没有理由认为平安时代的人们心里希望得到最高水平的北宋陶瓷。为什么呢？因为如有强烈的愿望，就能得到名瓷。这也是和早在八世纪以来输入的越窑青瓷水平不太高相吻合的现象。值此就可以理解，并进一步推断关于平安朝时代的大官显贵和豪富阶层对唐物怀有强烈的憧憬心情，他们拥有中国陶瓷的范围了。

五

在十一世纪后半期，向朝鲜半岛或东南亚诸地区大量输出优秀的中国陶瓷的过程中，向我国的输入情况一直处于低潮。这种情况在长期的中国陶瓷输入的历史中，继古坟时代之后，产生了第二个谜的时期，查明其原因可能是今后的重大课题，其背景笔者暗暗推想，与其说是输出的方面中国，还不如说是接受的方面日本，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

在十二世纪初，打破了这种输入沉闷停滞状况，并逐渐地给中国陶瓷的输入带来了生气。原来，对十二世纪，平安后期中国陶瓷出土品的研究，以在这一时期盛行的经塚随葬品为对象，从这些遗址具有的特殊性出发，而强烈关注白瓷的小品、盒子、小壶、小瓶、小杯、小香炉、水滴或白瓷经筒等白瓷。因此，有感于青瓷被忘却，利用近年来的考古学成果，龟井明德氏论述说“事实上，白瓷多并没错，例如在十一世纪后半的中心太宰府遗址内学校院跡SD860（沟）出土的陶瓷总数92片之中，有白瓷74件，青瓷8片，其它陶片10件的比例，青瓷细分为越州窑青瓷和高丽青瓷。十一世纪后半期的青瓷依然不能准确抽出，进入十二世纪，太宰府S×864（木棺墓）出土的有压印花纹碗、梳齿描花纹碗碟。前者是在器体内部配以二至三个连续的莲花纹，或者在其间放入莲叶纹，用半浮雕和梳齿画的手法表现。外面没有花纹挂有厚厚的稍微带暗绿色的釉，而且器壁厚。同样的划花纹碗，做成单朵花，从外面向里面划入曲线，在其间把云纹或花纹状的半浮雕，用图章压在中间的类型从各地出土。把梳齿花纹作为主要装饰花纹的碗和碟称为同安窑系，在碗的外面用纵方向的梳，里面用梳画的雷光纹篦描线区划。”龟井明德氏所说的，十二世纪的青瓷，里边是用半浮雕的方法，在器物周围雕出莲花卷草纹，例如福冈市东区高见二号墓出土的青瓷划花纹碗（第162图，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在里边表现莲弁纹的京都市右京区松尾西芳寺内采集的青瓷划花纹碗（第166图，京都大学文学部）为代表的碗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在福建泉州市附近同安窑的调查报告，刊载同样的瓷器；可以概括为在里边以雕出蔓草纹，其余空白处四周围以锯齿形的点缀纹的青瓷划花纹碗（例如福冈市东区下和白墓出土品，第171图）为代表的碗碟，可以概括为这二大类。这批继承北宋龙泉窑系谱的青瓷，进入南宋时代作为南宋政府的